

原先的二流國家美國和德國比在英國發展得更為迅猛，幾十年間形成了鼎立的三角格局。這表明在新一輪技術革命開始的時候，後起國家有可能奮起直追，迎頭趕上，改變資本主義的國際秩序。

《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一書不過十餘萬字，卻能從技術創新的角度簡明扼要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演化史，這是作者博採眾家之長的結果。如果說技術創新與技術—經濟範式的關係受到了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方式學說的啟發，那麼有關企業家和金融資本作用的論述無疑受惠於熊彼特學派的教益。對於「革命」與「範式」這兩大關鍵概念的構建則是從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理論中找到靈感的。關於「巨

浪」周期的論述經常在與俄國學者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開創的長波理論對話。為了解釋技術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佩蘿茨還吸收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要旨。

現實社會中的技術、金融與政治變革自然比理論要錯綜複雜許多。作者也提醒讀者不必把四階段模型看作一種機械的理論框架，而是當作觀察和分析資本主義的方法。這一方法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和理解過去，更有可能為未來提供借鑑和指導。佩蘿茨在書中預言，初見端倪的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很可能成為第六次技術革命的主題。如果真是如此，開個玩笑，資本主義倒是快要走完一遭佛教所謂的「六道輪迴」了。

斷裂與重構

- 侯杰、李劍



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著，王國良譯：《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隨着二十世紀80年代「文化史」、「社會史」的興起，「革命史」已漸漸遠離大陸學者。而美國布蘭代斯(Brandeis)大學教授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的著作《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另闢蹊徑，重新解構中國革命的歷史。作者發

《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的作者石約翰試圖解決兩個問題：一、如何以概念的形式表達中國革命的性質；二、近代革命與以前長期被誤解的古代中國有怎樣的聯繫。他將「封建」和「郡縣」這兩個概念作為「理論模型」的基點，以理解中國歷史。

在石約翰看來，近代以後的中國歷史是古代歷史的延續，不僅僅是西方衝擊反應的被動體，因此特別強調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動力而不是西方的外影響。吸引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力量，不僅僅是西方的技術與力量，還有中國人認為應該找回早已丟失的「封建」。在近代，中國已進入郡縣衰落階段，而西方剛開始轉入郡縣時代，更多的保有封建的特質。

現西方觀念雖然在近代中國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革命者與歷史學家卻忽略了中國本土的傳統、歷史背景。作者把革命及其與過去歷史的關係加以概念化，使近代中國革命的歷程與古代歷史傳統銜接起來。

從根本上說，作者試圖解決以下兩個問題：一、如何以概念的形式表達中國革命的性質；二、近代革命與以前長期被誤解的古代中國有怎樣的聯繫。

該書的獨到之處在於，作者在構架該書理論模型之前，提出並定義了一些基本概念，進而在論證過程中反覆應用和證明這些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將兩個中國傳統概念——「封建」和「郡縣」作為「理論模型」的基點，以理解中國歷史。作者堅信這兩個概念在西方理論佔據優勢之前，確實廣泛存在並被應用於歷史文獻中。所謂「封建」就是由世襲地方貴族分權統治的體制，具有等級森嚴、經濟結構禁錮、宗教唯靈的意識形態等特徵；「郡縣」則是疆域劃分為若干行政區域，並由中央集中管理的制度，具有開放的階級體系、市場經濟、趨向人文世俗的精神等特徵。然而「封建」或「郡縣」具有的特徵並非完全同時出現於同一歷史時期，在不同地區其發展的步伐也不同步。這樣，「革命」就被作者作為運動來分析——在封建社會內部的郡縣趨勢，或在郡縣社會內部產生反對郡縣社會的動盪。在描述中國歷史進程時，作者大量運用「封建」和「郡縣」概念來分析朝代的興替，又強調並非以

「封建」和「郡縣」用於中國古代歷史的分期。事實上，它們並不是劃分歷史的標準、依據，而是幾千年來歷史不斷發展的深層原因。

在書的上篇，分三章敘述了1800年以前的中國歷史，分別為：古代中國與中國思想的發展；郡縣制的中國；外國人與西方。讀後可以發現，上篇隱含着三條交錯敘述的線索：歷史脈絡的描寫；與之相適應的思想心態的發展；作者定義的概念。

首先，在前兩章中，作者用近半的篇幅勾勒了中國古代由漢至清的發展脈絡。作者認為郡縣制度具有高度集權和嚴密組織的官僚體制，不僅僅是統治者不斷集權的過程，而且是有着相當威望和特權的貴族家族沒落，從而形成有利於開放的、變動的由貧民組成的社會和政府，皇帝的獨一無二性隨之增強。

其次，作者討論了與歷史發展相對應的中國思想史，或許稱之為心態史更為貼切。作者十分關注精英哲學的傳播與民眾心理的變化，在論及中國革命歷史背後的民族心理、民眾心態時，則借助「天命」等概念加以闡釋。作者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佔主控地位的思想，並在某種程度上引發或催生了「封建」向「郡縣」的革命。應該說，該書成功地進行了心態史學的研究，展開了對於歷史傳統背後的思想、意識、信仰的探討。例如，作者提及，民族主義強調一個人是否漢人，認為政府王朝是絕對不正確的。而文化主義則強調，對於一

個人來說重要的是他接受和實踐中國文化，出生地與種族背景並不特別重要。

在下篇中，作者不再着力於闡述概念內涵，而是更多地應用概念以及理論框架來敘述歷史。由此，作者證明概念是一種有效的分析視角。

在作者看來，近代以後的中國歷史是古代歷史的延續，不僅僅是西方衝擊反應的被動體，因此特別強調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動力而不是西方的外影響，通過使用中國傳統概念及分析模式而不是西方理論來闡明中國歷史。作者用「封建」和「郡縣」的概念說明中國近代歷史如何掙脫「郡縣」和復古「封建」，作者認為，康有為在儒學內部重新振興大同傳統。作者以為從社會政治意義上來說，近代的西方並不比中國更近代化。吸引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力量，不僅僅是西方的技術與力量，還有中國人認為應該找回早已丟失的「封建」。在近代，中國已進入郡縣衰落階段，而西方剛開始轉入郡縣時代，更多的保有封建的特質。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的基本觀念是仿效迅速成功的日本。然而日本與西方一樣在現代化的同時也從封建向郡縣過渡，這樣就比較容易效法西方的社會政治和軍事技術。但是中國卻不能，因為中國正處於郡縣衰落的時代。作為郡縣時代的終結，從辛亥革命之後至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中國社會嘈雜而混亂。與以前兩千年的反叛大體相同，人民的勝利以偉大起義的方式獲得。可是這一時期的革命不僅反對郡縣

制，也反對西方。比較典型的當屬辛亥革命：同古代起義一樣，這種革命表明平民與上層之間的溝通之路被阻斷，而它本身只是常規政治的繼續——使形勢惡化以引起北京的注意；唯一不同的是，當社會赤貧和窮則思變超過起義帶來的破壞時，起義者就成了時代發展的先驅。辛亥革命爆發時精英與民眾以相當快的速度結合起來，不僅表明兩者同樣面臨困境，還說明郡縣時代後期的自由程度和階級界限的模糊——代表社會關係三個基本方向：年齡、性別和地位的「三綱」已經瓦解，使得郡縣制確立的地位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性別和年齡似乎也該被拋棄了，因此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表明「郡縣」時代的結束。

從書的下篇來看，作者比較關注近代已經擴展到公共領域的問題，認為政治問題的解決可能需要部分地借助於中國傳統。由此作者重新審視了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兩者造成了中國歷史的斷裂。

五四運動的重要在於精英人物接受了一百年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中國是一個落後、愚昧和不道德的社會。他們發現國民的生活艱難困苦，同時認定中國問題的根源不是清朝的弊端，甚至不是郡縣制，而是中國文化乃至貫穿整個歷史時期的文明方式。他們把過去視為一個整體，並把它作為「傳統」與現實截然對立起來，認為傳統與現代的斷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而馬克思主義的超越性引導已經否定自己和過去有任何關係的五

作者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原因，是其最終目的在於追求社會平等，這與中國的「大同」傳統有某種聯繫。而列寧把共產主義定義為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對於希望富強的中國人來說，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同時列寧主義關於黨的概念，提供了宗教式的、狂熱的組織形式——而這三點同歷代中國革命極為相似。

「封建」與「郡縣」是作者解讀中國傳統革命史的切入點，但作者未能徹底解決如何定義近代革命歷史的問題。換言之，作者提出1800年以前的歷史階段與「封建」及「郡縣」有關，可以成立；1800年以後，早期的歷史似乎仍受郡縣制的影響，也說得過去；可是在論及中國當代歷史時，作者就不得不用「新階段」這一未經定義的詞加以概括了。

四時期那一代人，並加劇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混亂。作者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原因是其最終目的在於社會平等，這與中國的「大同」傳統有某種聯繫。列寧把共產主義定義為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對於希望富強的中國人來說，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同時列寧主義關於黨的概念，提供了宗教式的、狂熱的組織形式——而這三點同歷代中國革命極為相似。五四時期造成的傳統與現實的斷裂一直困擾着中國的發展，也為集權開闢了道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路線不是來自蘇聯，也不是來自中國的傳統，中國人既不成熟又不覺悟，是「一窮二白」的，那麼要想獲得成功就只能依靠共產黨特別是領袖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因此作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與五四時期的文化模式有着直接的聯繫。在我們認真分析和考察十年浩劫給中國社會、文化帶來的巨大影響時，應該對該書的這一觀點進行進一步地分析。

然而應該負責任地指出：作者對於原始資料的發掘和使用不夠充分，基本資料主要來自於美國漢學研究著作，如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的《東亞：偉大的傳統》(*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柯文 (Paul A. Cohen) 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胡克 (Charles O. Hucker) 的《中華帝國的過去》(*China's Imperial Past*) 等。對此，作者也直認不諱。這樣就極有可能會出現對史料、史實的誤讀或誤解，概念轉換使用過程中造成

偏差。例如作者認為1959-1961年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是源於自然災害，而是公社生活的艱難驅使許多農民來到城市，田地無人照管，進而出現了糧食短缺 (頁223)。

從全書的構架上，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封建」與「郡縣」是作者解讀中國傳統革命史有效的切入點，但是作者並沒能徹底解決如何定義近代革命歷史的問題。換言之，作者提出1800年以前的歷史階段與「封建」及「郡縣」有關，可以成立；1800年以後，早期的歷史仍受郡縣制的影響，也說得過去。可是在論及中國當代歷史時，作者就不得不用「新階段」(頁208) 這樣一個未經定義的詞加以概括了。此外，該書是縱貫歷史時空的，但在處理的過程中也有套用既成理論模式之嫌。作者為了集中討論與「中國革命史」有關的問題，將有爭議的事實排斥在革命的視野之外。

通讀該書，如下幾點值得特別提出：

首先，書中顯示出西方學者普遍敏銳的社會性別視角。例如作者提出，郡縣的新體制引起婦女地位的下降是毋庸置疑的。在以出身為明確劃分階級的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大體上與男子的地位相稱；郡縣時代要求婦女從思想到行動上都自覺地處於從屬地位 (頁44)，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男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作者提出中國的革命運動普遍把婦女權利放在重要位置、革命的因素中無一例外地與提升女性地位有關，儘管這一觀點還值得進一步研討與證明，但是「革命與女性」確

實是中國革命史和社會性別史都要關注和加以解決的重要理論命題。

其次，選擇甚麼樣的詞語，表達甚麼樣的情形，符合甚麼樣的場合與對象，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文化傳統，而這本身就是歷史。在外語中尋找與母語類似的含義是翻譯的基點，但隱藏在詞語背後的時、地、人、事，卻可能在外語的環境中根本不會出現。例如，作者就為「郡縣」一詞在英文中無從對應而頗費筆墨(頁70)。作者解釋，「也許『資本主義』在最一般意義上的後封建社會、或『近代』即中央集權官僚政府、市場經濟、市民和世俗的價值觀方面可以給人們一些相應的感受」(〈序言〉，頁3)。這就是歷史經驗的差異性決定的歷史研究的難點。所以跨文化研究不得不從事的工作之一，就是翻譯的辨析。這類問題解決得好與壞直接影響到歷史敘事本身。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看，西方在十九世紀對中國的蔑視和敵意同英文civilization這個詞語有關。「文明」一詞源於拉丁文的城市city，而中國大量存在的農民自然與城市無關，中國於是也就被認為是原始和劣等的。

要使西方讀者明白中國歷史，必須經過一個翻譯的過程。這不僅僅是詞彙，而是整個概念體系的翻譯，如果沒有共同的分析範疇，似乎沒有辦法更好地把西方和近代中國歷史聯繫起來。從某種程度上講，翻譯已從功能對等發展到動態對等的理論，事實上已經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語境對翻譯等值的影響問題。這也是當代海外漢學研究呈現

出來的較具共通性的特點之一，表現為「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在文化層面上審視、考察翻譯，從某種意義上說翻譯研究正在演變成為一種文化研究」(謝天振：〈文化轉向：當代翻譯研究領域的新拓展〉，載樂黛雲、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第15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頁66)。學者愈來愈多地視翻譯為話語製造的實踐活動，而貫穿文化而表現出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翻譯只是一個傳介的過程，並不可能超越於意識形態之上，而恰恰是穿行其中(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7)。

最後應該說該書也是受到某些「後現代主義」影響的著作。無論人們如何看待與評價「後現代主義」，它的意義和價值都不容否認。例如它提供了復興和擴展文化政治學的可能性，即並非從國家這樣的宏觀政治意義上來認識文化歷史，而是從存在於社會各處的權力關係網絡的微觀政治意義上來加以關注。這些觀點「與超越包羅一切的全球中央歷史和政治敘事的運動是一致的，與對差異和鬥爭局部的、特殊的、補償性的強調是一致的」(康納[Steven Connor]著，嚴忠志譯：《後現代主義文化——當代理論導引》〔上海：商務印書館，2004〕，頁345)。而有關革命、種族、性別等問題的研究正在試圖證明更為寬泛、更為自由的自我決定形式的合理性。對此，我們也應該投入更多的熱情予以關注，並展開對話。

要使西方讀者明白中國歷史，必須經過一個翻譯的過程。這不僅僅是詞彙，而是整個概念體系的翻譯，如果沒有共同的分析範疇，似乎沒有辦法更好地把西方和近代中國歷史聯繫起來。學者愈來愈多地視翻譯為話語製造的實踐活動，而貫穿文化而表現出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翻譯只是一個傳介的過程，並不能超越於意識形態之上，而是穿行其中。